

[DOI]10.19649/j.cnki.cn22-1009/d.2020.01.005

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历史丰碑： 十月革命的新纪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

孙力¹, 翟桂萍²

(1. 华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37; 2. 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自诞生起的百年历史, 树起了两大历史丰碑。十月革命开辟了社会主义的新纪元, 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中成为一种现实, 开辟了人类现代化的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 使科学社会主义开启了民族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 确立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范式, 也就是通过社会主义的民族胜利以实现推动更大范围的人类解放, 进而使社会主义逐渐成为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存在。

[关键词] 科学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D6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478(2020)01-0033-07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诞生的那一天起, 就在实践中不断地开拓前进, 它的科学性深深地扎根在实践之中。作为对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揭示, 科学社会主义的元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充实完善。但是, 越具有元理论属性的理论, 越是需要长期的、广阔的实践作为支撑, 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探索和认识, 需要在思想积淀基础上逐步的理论飞跃。十月革命开拓了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新进程, 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 由此也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百年来的巨大贡献, 包括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影响, 人类社会不可能达到今天的发展水平。

但百年来的实践还包蕴着十月革命在科学社会主义元理论上的重大贡献, 它涉及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和历史进程问题。立足于一个较长的历史坐标, 可以较好地认识到十月革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新发展,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再一次使这一元理论迈上了新的台阶。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 必将在这些重大理论创新的引领下前行。

马恩阐述了资本主义成熟基础上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的基本理论, 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也是立足于此。十月革命及其百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 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性发展, 从而减少社会发展的代价, 完成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和社会发展还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 开辟人类现代化的新路。

立足于唯物史观和对欧洲近代以来社会革命和社会发展的详细考察,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和历史进程作了清楚的阐述。其基本要点是: 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一级的社会发展形态; 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代替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社会主义只能够建立在充分发展的成熟

[收稿日期] 2019-01-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研究”(15BKS004)。

[作者简介] 孙力(1955-), 男, 法学博士, 华东理工大学特聘教授; 翟桂萍(1975-), 女, 法学博士,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政治学与国际政治教研室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世界性的。

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些基本理论的引导下不断向前推进,但理论本身也需要实践的检验和推动。到十九世纪后期,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成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因为它要回答社会主义革命究竟会在什么时候爆发,首先从哪里爆发的现实问题。

马恩是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进行分析的,它有两个非常清楚的观点:一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单独的某一个国家的革命,因为大工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建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把全球各国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使得国家之间的彼此影响越来越大。大工业的发展还促使所有文明国家具有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进程,也就使得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为了当时各个国家中处于决定作用的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就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斗争,也就是使得“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1]241}。二是生产力发达的国家将走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列,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发展的快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1]241}。因此,马克思认为英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较大,并将具有较大影响,认为英国如果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于一切被压迫者战胜他们的压迫者具有决定意义”^{[1]309}。

然而,社会主义运动却出现了新的更加复杂的情况。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不断完善,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制度的逐步建构,等等,使其社会矛盾反而得到缓和,社会主义运动则徘徊不前。但另一方面,在相对落后的一些国家,比如俄国,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人运动水平不断提高,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日渐凸显。这一时代背景就提出了如何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运动历史进程、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方位等问题。面对新的时代挑战,马克思恩格斯也在一系列的著作中开始了新的思考,这些思考构成了对既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补充。

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否认了把他《资本论》中立足于西欧的研究结论用于俄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认为这种做法是极其不恰当的。他指出,如果要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分析变成一切民族都可以走的道路,也就是把西欧的发展道路变成一般发展道路,这种做法“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466}。马克思对这一做法的否定的重要价值在于,提出了落后国家社会发展进程具有特殊性的命题。

几年后,马克思写下了给查苏利奇的信,总共有四份手稿,约15000字左右,阐述了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的基本观点,即被称之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即“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2]587}。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马克思复信的最后一稿,文字最短,仅600多字,且没有沿用前面卡夫丁峡谷的提法,马克思在对自己所能找到的原始材料进行专门研究的基础上,更加审慎地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但要使其能够发挥这一作用,是有条件的,就是“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2]590}。

马克思的审慎是符合唯物史观的,他没有让自己的理论超越实践,只是在原理的基础上论述了大致的发展态势,既为这一问题的探讨指明了方向,也为其留下了巨大的研究空间。给查苏利奇回信的第二年,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对俄国革命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精炼的和审慎的补充:“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251}

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始终坚持马克思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能够不重蹈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而发生的观点,但却强调了社会发展阶段性作为自然历史进程的客观限制性。恩格斯1894年《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再一次阐述俄国革命问题时指出:“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

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3]458} 恩格斯更加重视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此,他对俄国革命的特殊性作了比马克思更加严格的限制,认为俄国革命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也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3]443}

恩格斯明确限定俄国革命一定要在欧洲发达国家革命的引领下发生,即前者需要后者提供榜样,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一定是从发达的工业国开始的。经典作家的这些思想对俄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依然没有出现,相反,俄国倒是出现了革命的热潮。1905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推动了代议制、多党制和宪制在俄国的发展,而且使俄国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更进一步走上俄国的政治舞台,追求自身的解放。在这一进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了总政治罢工、武装起义等斗争方式,还创立了苏维埃这一社会主义的代议制形式。仅以苏维埃这一新的国家机构创建来看,就已经超越了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布尔什维克政党的诞生。它完全不同于此前的欧洲型的社会主义政党,而是有着严格的政治纪律和严密的组织体系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而欧洲的无产阶级政党恰恰没有能够朝着这一方向发展。

尽管1905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能够如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所愿,进一步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但它已经显示了自己非同寻常的历史坐标。十月革命正是以这一历史坐标为出发点的必然结果。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依然有人认为十月革命是“早产儿”,是违背历史规律走入的误区。在当时,即使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更是普遍地认为俄国只应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社会主义革命是等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的事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当时在布尔什维克中普遍的看法是,俄国在经济发展方面,还不足以实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是无法实现的。”至于“比布尔什维克人数多得多的孟什维克,也不相信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认为在俄国所期待的革命,暂时应采取资产阶级的形式。他们同意资本主义是每个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这种看法”^{[4]59,60}。

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列宁指出俄国当前革命的形势,是推动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也就是要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从而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任务。然而,《四月提纲》遭到党内多数中央委员的反对,他们认为当时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条件还不具备,最终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否决了列宁的建议。^{[5]164} 在1917年6月彼得格勒召开的全俄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建议政权转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随时都准备夺取政权。然而,也被否决了。^{[5]165} 列宁的思想之所以不能够顺利地由布尔什维克以及布尔什维克领导集团接受,其最基本的原因是如何认识经典作家阐述的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先于和引领较落后国家的理论。大多数人对这一理论的坚守与列宁的创新超越形成鲜明的对照。列宁能够发动和领导十月革命,开创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个并不发达国家胜利的先例,源于列宁对资本主义发展态势和俄国社会矛盾的深入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以“世界历史”阐发了资本扩张的全球化规律,而列宁则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也并不是整体性的,在资本主义不同国家间,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列宁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这一绝对规律,进而提出了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即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6]554}。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唯物史观强调历史环境、社会存在的决定性作用,能否正确地对其分析定位,关系到唯物史观的成功运用。

列宁不仅深刻分析了时代发展的大趋势,而且分析了革命将产生的社会矛盾的展现态势。认为没

有革命的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但需要注意的是并非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列宁分析了革命发生的三种形势:(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6]460,461}正是在这一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列宁根据当时俄国的形势成功发动了革命行动,并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不仅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而且也实现了理论本身的新飞跃,即基本理论的创新:它明确回答了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进程问题,即同处于资本主义时代和历史进程中的相对落后国家可以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它意味着在“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之后,还应该认识到:社会主义并不必然是成熟资本主义的产物,跨越“卡夫丁峡谷”是这些国家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选择。所以,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不需要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也继续证明了这一点。

在此基础上它又重新诠释了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方位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科学社会主义元理论的阐述和分析,把社会主义定位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基础上的产物,如果不从元理论上加以阐释,十月革命就只能是一种偶然,甚至被解读为误区,但它实际上酝酿了新的元理论,即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并不一定要完全终结才能够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它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

更进一步讲,它创造性地诠释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马恩阐述了资本主义对世界史或者说全球化进程的开拓,同时也将它作为资本主义丧钟敲响的社会条件,因为它导致了世界性的无产阶级联合。十月革命意味着,社会主义开拓的是又一种现代化进程,它并列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人类社会开始了一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共生的新纪元。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开拓了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更在于如果没有对元理论的开拓绝不会取得历史性的成就,而其中一些重要的贡献恰恰承接了十月革命开拓的谱系。中国道路不仅完善和丰富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还成功地升华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理论。中国梦则指明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方向和目标,即通过社会主义的民族胜利实现更大范围的人类解放。

十月革命初步提出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但俄国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落后国家,也不是非资本主义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命题的提出尽管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苏俄革命的实践不可能完全阐明这一问题。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落后国家,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功与否,才能真正回答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

中国道路是迄今为止对“卡夫丁峡谷”命题最为成功的回答,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元理论的宝贵贡献。它既有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回答,也有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建树。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元理论的贡献。毛泽东总结的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升华,也是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规律的揭示。1939年10月,毛泽东在撰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出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并进一步指出,“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7]605,606}。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高度评价了这三个要素对中国革命的意义,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7]606}

对马恩阐述的科社元理论来看,中国革命具有特殊性;但从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进程以及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来看,中国革命则具有普遍性。三大法宝毫无疑问体现了这种普遍性。从统一战线来

看,它涉及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力量问题。大工业的发展带来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这是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必要条件,而落后国家恰恰没有这一必要条件。十月革命没有这一问题,因为已经具备了这一条件,是工人阶级完成的革命。如何解决还没有壮大的工人阶级队伍问题,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元理论。毛泽东对这一问题做了极为深入的研究。他指出,到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18]7}。这一数量不到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无论如何仅靠工人阶级是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毛泽东甚至对资产阶级也做了区分,要动员其中的左翼参与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中。毛泽东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买办阶级和中产阶级,明确地说“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18]4},在此基础上对他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强调了他们具有的两重性以及对于革命的意义,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使他们可能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也存在成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7]640}

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也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的重要命题,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重要理论,也是对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这一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19]620}决议强调了对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涌现的一切的英勇战士,都应该被吸收入党,进而为党工作。而这种党员成分的复杂性一方面是中国革命的现实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绝对不能因为党内成员成分的复杂性而减弱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地位。决议指出,“事实证明,这样成份的党,是能够完成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国际所给予的光荣任务的,是能够艰苦奋斗百折不回的”^{[19]620}。

这就进一步涉及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问题。十月革命的成功,与列宁主义政党的成功建设密切相关。布尔什维克完全不同于欧洲的工人阶级政党,它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具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从而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这一宝贵贡献恰恰是被中国共产党最好地予以了继承和弘扬。然而,这一伟大的开拓则是极为不容易的。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存在巨大的困难。首先,在总人口中数量占比太小,意味着不能够集聚起足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队伍使革命取得胜利;继而,即使在动员起其他革命阶级后,仍然面临是否能够以非工人阶级成分为主体建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毛泽东在1929年红军第四军的党代表大会上提出思想建党的重要理论,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性问题。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元理论,即工人阶级充分发展壮大才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创造性发展,使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开拓了先于发达工业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在列宁主义政党建设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形成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整套系统的理论,不仅对落后国家,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都具有普遍性意义。它意味着,在现代政党政治的背景下,无产阶级的政党政治要超越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必须打造出站在时代前列的先进政党。

武装斗争的理论也具有基础性的开拓意义。尽管经典作家肯定了暴力革命的基本原理,但从他们论述的具体内涵来说,仅是指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而中国共产党阐述的武装斗争则有更丰富的内涵,更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当今时代的客观规律性。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日益成熟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已经难以取得革命的成功,无产阶级军队的建设、军事斗争规律性的把握等,都必须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否则当代社会主义革命就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了。

中国梦是中国道路的必然结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化场景。它对科学社会主义元理论的探索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要走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这同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所不同。马恩阐述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所具有的一个鲜明特点,即它的统一性。马恩强调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0]484}并宣告:“工人没有祖国。”^{[11]291}也就是说,根据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实际,马恩强调了运动的统一和协调一致性。从马恩领导和影响下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斗争可

以清楚地反映这一特点。

列宁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继承了马恩强调社会主义运动统一性的思想。1919年,在列宁推动下成立的第三国际,也称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就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等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文件。1919年3月制定的《共产国际行动纲领》指出:“共产国际要使所谓国家利益服从国际公民的利益,它要体现各国无产阶级的相互支援;无产阶级没有经济方面和其他方面的相互支援,就不能组织新的社会。”^{[11]63}

苏共寻求和充当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这也与社会主义元理论中强调社会主义的统一性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的贡献从根本上超越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般规律。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其意义不只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它实际上牵涉到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立足点问题,社会主义的元理论从解决世界性的、一般性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转向解决民族性的、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即把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心从国际层面转向了民族国家的层面。此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和斗争实践都聚焦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进行了再探索,走出了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苏共否定社会主义运动的民族性发展道路。季诺维也夫在《列宁主义》一书中指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条件下的具体化和发展”^{[12]4}。他事实上指出了列宁主义所具有的民族特点的问题。但斯大林并不认同,批评了季诺维也夫等人把列宁主义仅仅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实际情况中的应用”的观点,坚决反对把列宁主义局限在俄国一国之内,而是强调列宁主义的国际属性,指出不能“把列宁主义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说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13]395,396}。这一思想决定了其必然把适用于俄国的列宁主义向其他国家扩展,进而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的统一性原则。然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一锅煮”“一刀切”模式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不适应当代的社会主义发展,而中国道路和中国梦则为当代社会主义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中国共产党人在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之后,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强调了中国特色道路这一理论发展所具有的民族性,强调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所具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这一理论创新,推动了社会主义的话语表达由具有统一性整体性的世界属性向具有民族国家属性的转型。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现代化发展贡献了新的途径,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认可,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共产党试图像“苏联模式”那样使之成为广泛使用的教条而推而广之。中国共产党清晰地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贡献,是为世界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强调的是这一理论体系所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中共十八大从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概括,均明确地限定了其所具有的民族特性,之后又进一步强调了其文化属性。与此同时,习近平用中国梦来阐释中国的社会主义图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4]35}

由此可见,中国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是立足于民族国家的基础而不是全世界的基础,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运动一般规律的超越和发展,即社会主义在这一新的时代,要扎扎实实地推进民族国家范围内的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态势应该是多样化的、民族性的,而不是整齐划一、统一推进的。中国通过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揭示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规律,如果说十月革命和苏联模式开辟的是社会主义统一化整体推进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则是社会主义展现多样化道路的新时代。实践证明,当代社会主义只有坚持民族化、多样化的发展道路才能够取得新的伟大胜利。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元理论所作出的宝贵贡献。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英]G.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M].何瑞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5]沈志华.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6]列宁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毛泽东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2][苏]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M].上海:东方出版社,1989.
[13]斯大林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The Two Historical Monument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 New Era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nd the Opening of Socialism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N Li¹, ZHAI Guiping²

(1. School of Marxism,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2. School of Politics, PLA University of National Defense,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e century hist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since its birth has set up two historical monuments. The October Revolution ushered in a new era of socialism, made scientific socialism a reality in the world history, and opened up a new way of human modernization. The opening of socialism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opened the road of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established the basic paradigm of contemporary socialist movement. Through the national victory of socialism, we can realize the liberation of human beings in a wider range, and make socialism gradually become a kind of existence with worl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 October Revolution; Socialism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郑伟